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邱晨辉

新质生产力，乘势而上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赵丽梅
记者 赵安琪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24年政府工作十大任务，其中，“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排在诸多任务之首。

3月5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他所在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正如新质生产力这个词的热度不断攀升一样，新质生产力本身的发展也正乘势而上。当前，新质生产力在人工智能（AI）、互联网、制造业、农业等诸多领域方兴未艾。未来，它也将为撬动这些行业的蓬勃发展提供新的支点。

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

作为信息通信领域的代表，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湖南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程伟关注到，报告对加快培育和形成新质生产力作出了系列部署。他认为，这不仅对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也为其今后的工作指明了发展方向。

在程伟的理解中，创新对新质生产力起主导作用，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三高”特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信息服务业既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领域，也为其他领域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重要支撑。在程伟看来，以5G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创新发展，以及AI等技术进行有机结合，将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实现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融合发展，不断培育壮大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一定程度上将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打牢“底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就是新质生产力。”全国政协委员、知乎创始人、CEO周源表示，自己所在的互联网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有很大的想象空间。

当下，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领域——AI领域是全球竞争的战略高地。近段时间，大模型的热度居高不下，关于Sora、Gemma等大模型的讨论一直在持续。

国内在大模型领域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周源指出，截至2023年年底，中国累计发布200多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其中有20多个大模型产品获准向公众提供服务。同时，他也关注到，大模型发展仍面临着一些挑战，其中最显著的问题之一是高质量中文语料资源的短缺，他建议加快开发利用。

全国政协委员、360集团创始人周鸿祎也很关注大模型的发展。在他看来，2024年是大模型应用元年，中国可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大模型发展之路。

“大模型在垂直领域大有可为。”周鸿祎建议，深化AI多场景应用，支持大模型向垂直化、产业化方向发展，助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他谈到，政府、央企国企可以率先提供更多应用场景，为发展垂直化、小型化、低成本的大模型开放更多“小切口、大纵深”的落地机会。他也提醒，企业用大模型不能冒进。

新质生产力不止于大模型，还有更广阔的空间。如果把新质生产力具象化，可以是以国产大飞机、国产大型邮轮、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第四代核电技术等为代表的一大批重大科技成果；可以是为中国制造增光添彩的“新三样”：新能



3月6日上午，北京友谊宾馆，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环境资源界小组会议上，委员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审议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讨论计划报告、预算报告、国务院组织法修订草案。2023年起，全国政协的34个界别中首次出现了“环境资源界”。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峥/摄

源汽车、锂电池、光伏组件；也可以是AI；还可以是插上数字化、智能化翅膀的传统制造业、农业。

“新质生产力吹响了科技创新的‘冲锋号’。”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奇安信集团董事长齐向东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根本上取决于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的创新突破能力。

需要不同类型的企业发挥合力

一提到新质生产力，更多人想的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事实上，传统产业也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大舞台。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也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很多重大科技成果，背后是央企在科技领域多年的布局在支撑。3月5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首场“部长通道”集中采访活动上，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张玉卓表示，自己也在谋划央企如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他用“源”“升”“态”3个字来描绘今后中央企业的发展路径，即技术源头、产业升级、产业生态。

张玉卓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还是要把创新放在突出位置，创新和质优是重中之重。此外，央企企业在自主创新方面要“顶天立地”。要通过开放创新和自主创新，真正把“顶天立地”立起来，这是解决新质生产力的技术源头问题。

当新质生产力有了技术源头，下一步，最主要的便是推进产业升级。张玉卓谈到，一方面，产业升级一定要把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摆在突出位置。另一方面，央企在传统布局比较多的行业，也要利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进行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效率。

近期，一些央企插上数字技术的“翅膀”，一些传统产业焕新。例如，煤矿井下可以实现自动化、无人化、智能化，井下采煤工作面上就不需要人了，进一步提升煤矿的本质安全。

据了解，国资委还启动了“人工智能+”行动，其中，“人工智能+”行业涉及的很多都是传统产业。

激发新质生产力的活力需要不同类型的企业发挥合力。

民营企业在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方面大有作为。周源谈到，民营企业具有较强的灵活性，愿意从小切口切入，寻求大机遇。“民营企业可以先从小切口进行尝试，所以民营企业就像是新业态的一个试验田。”

今年，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提交了一份与粮食安全和新质生产力有关——《关于利用数字技术为畜牧业节粮增效 注入新质生产力》。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农业领域深耕多年的他一直很关注粮食安全问题。猪是食粮大户，对于作为养猪行业从业者的刘永好来说，节约粮食，“从养猪做起”。他希望，通过数字节约提效，为行业注入新质生产力。

在农业领域，一直有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说法。刘永好希望，藏粮于产，即通过生产性能提升而节粮，通过生物科技、智能科技、数字科技，农牧行业正在焕发新生机，在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新时期得以焕新。

他也很高兴地看到，自己所处的领域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氛围也很浓郁。比如农业领域的生产关系正在变革，拥有新技能的新型农民正在加

速成长和，生物科技、数字科技和AI技术赋能农业的领域越来越广，育种技术越来越强，农产品生产加工效率越来越高……这些都是新质生产力乘势而上的例证。他相信，新质生产力将为这一传统行业带来利好。

这只是新质生产力赋能传统行业的缩影，未来，新质生产力将为更多行业实现“蝶变”蓄能。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电气装备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创新部部长张帆对于正在发展的新质生产力充满信心。他相信，未来，随着我国整体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将整个创新链条打通之后，新质生产力肯定可以实现快速发展。



3月6日下午，北京丰大国际酒店，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工商界小组会议上，全国政协常委李琪（左）与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陈小平在会上交流。当日，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举行界别联组会议、小组会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审议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讨论计划报告、预算报告、国务院组织法修订草案。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峥/摄

加快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上接5版)

近年来，不同的力量在拉动着这条水平线。比如，户籍制度持续发力，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基本取消了落户限制。

对此，毕井泉今年在提案中提出的第一条建议就是“放宽农业转移人口的落户限制”。他认为，300万以下人口城市放开落户的规定，要继续落实好。与此同时，300万以上人口大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限制，也要放宽。如果以50平方米住房来计算，城市房屋总价不高于当地农民家庭年收入8-10倍的城市，都可以放开落户限制，允许购买房屋的农业转移人口就地落户。

理解“19%”，要实事求是

陈力觉得，理解那“19%”，要看具体情况，这是他在调研中的一个感受。在重庆和河南一些地区，他了解到，当地的农业转移人口主要是“本地人”，从乡村流动到市区或省会城市，离家不远。有些人主观上希望保留农村户口，享受的公共服务也与市民没有显著差别，他们的落户需求不高。

但在北京、上海、深圳这些特大城市，情况就不太一样了。陈力也给记者讲了一道算术题：上海2500万常住人口，有户口的不到一半，另外1000多万人，来自全国各地。待久了，很多人更想留下来，没有户口，买车买房，小孩上学，确实会遇到麻烦。

在他看来，一个人，无论是不是农业人口，年轻时来到一座城市，想融入这座城市，把家建在这里，找到归属感，“经历着一样的故事”。他也认为，要解决好那“19%”的问题。

陈振就在这个数字里面。他属龙，今年36岁，出生在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的一个村庄。2006年，他刚成年，就到北京工作，当过保安，做过房产销售，如今是一名快递员。这些年他结了婚，有了娃，妻子是同事，孩

子在老家，父母仍在务农。

在北京生活16年之后，陈振说，“我没感觉到我不是这里的人”。他经历了这座城市的扩大，感受到奥运会的欢腾。他适应这里的季节，熟悉大街小巷，还拥有很多朋友。去医院看病他也没觉得麻烦，因为“有社保”。

他从小不想离开北京，但又不得不想，买不起房子，老了怎么办？他和一起出来打工的弟弟都在老家的县城买了房，“是条退路”。

这是一个典型的农业人口转移的故事。在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毕井泉曾发言探讨过陈振这一群体遇到的问题：人口在千万以上、房价过高的特大城市，农业转移人口的居住问题突出。

在去年的调研中，毕井泉了解到，春节过后一些农村地区离婚率较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进城务工、长时间分居的夫妻过年时才返乡团聚，容易爆发矛盾。他还非常留意关于留守儿童的新闻，关注他们的成长，希望推动“孩子到父母身边去生活”。

“我们得从他们的角度来考虑这些事情。”毕井泉说，“也要从社会的层面去考虑。”

陈力也建议，适当放宽除个别特大城市以外的落户限制，精简落户积分项目，提升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向常住人口全覆盖——这个“全”，是要把那“19%”覆盖到，包括让随迁子女平等接受教育、根治农民工欠薪问题、保障农民工拥有社会保险，以及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将城镇常住人口纳入住房保障政策范围。

“转移”不是户籍的简单迁移，也不是人口的自然流动

去重庆调研时，陈力和外卖员、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都聊过，他觉得“这种职业的可替代性比较高，流动性大”，归属感比较低。而在一家模具厂，他发现，由于企业对工人的技术能力要求很高，产品有竞争力、有市场，农村人口的工人流动性不大，很多人彼此相处多年，对企

业和城市的归属感都很强。

这个发现促使他思考，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除了社会保障逐步跟上，国家还应该从产业布局层面有所考虑。有了政策的正向激励，为农业转移人口稳定性付出的成本就会低一些。

“我们有制度优势，不光靠市场因素，还可以由政府对年轻人进行引导，让他（们）在到达工作年龄之前，有目标地进行学习储备。”陈力说。“咱们给小孩找工作，除了兴趣爱好，还要考虑国家的长远布局。”

毕井泉也指出，需要大力发展制造业，鼓励发明创新，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更多在城市就业的机会。

大量的“农业转移人口”，一直在“服务”着国家的布局。有人说，1979年的蛇口工业园，是第一代农民工群体打下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根“地桩”。

在毕井泉看来，这些城市的建设者老去了，很多已退回曾经的家乡。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有些就在城市里长大，不能让他们因为“出身”的问题，觉得这座城市“不属于我”。

“其实，我们的城市发展离不开他们。”毕井泉对记者说。

陈力指出，除了与当地人共同建设城市，农业转移人口的到来也拉动了城市住房、教育、养老、医疗和休闲娱乐方面的需求，拉动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通过新的消费与投资释放出更大的内需潜力，使城市更加繁荣。

2022年，上海暴发新冠疫情期间，快递员陈振曾去“支援”。当他把生活必需品一件件送到人们手里时，“特别有成就感”。上海一解封，他迫不及待地回到北京，“赶紧回家”。

到2025年，还将有大量农业人口转移到城镇。陈力说，他们的市民化，不是户籍的简单迁移，也不是人口的自然流动，需要有一套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支撑这个群体从农村到城市生活场景的转换。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乡村振兴的步伐，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有了很大改善。当被问到要不要接父母来北京时，陈振笑了。他说，老家村子如今挺好，建得漂漂亮亮，啥都有，看病也方便。

谁来掌握未来的生产力

代表委员建言加快培育新型劳动者队伍

“新质生产力”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也是代表委员们最关注的话题。

谁来创造新质生产力，谁来掌握新质生产资料？这是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三研究院科技委员会委员路红波最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他所在的研究院正在进行数字化转型，其中有瞄准新质生产力的数字化研发和智能制造能力提升。

一个现实问题是，数字化转型必须有一支有力、高水平的数字化工程队伍来支撑。

“这是高端人才，需要各方联合培养。”路红波今年带来一份建议，提出建立国内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联合人才培养机制，形成数字化“产、学、研、用”综合应用平台、人才实训基地等，供需两侧共同培养数字化高端复合人才。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张云泉也建议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人才。

张云泉在全国两会召开前就注意到，中央办公厅有关负责人在解读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时提到，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要把握好三点，其中第一点就是要打造新型劳动者队伍，包括能够创造新质生产力的战略人才和能够熟练掌握新质生产资料的应用型人才。

“培养既具有科技创新能力又能熟练应用AI新技术的人才，尤为关键。”张云泉说。

身边的委员经常向他了解人工智能的最新进展。他认为，通用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预示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到来。

然而，能创造生成式AI，以及熟练应用这一工具的人才在张云泉看来十分有限。他调研后发现，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课程内容更新滞后。由于人工智能发展迅速，学校的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无法及时跟上技术进步的速率，学生学到的可能是已经过时的知识和技能。

“我们还面临着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张云泉说，目前，合格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教师相对稀缺，影响了教学质量。

作为高校一线教师，全国政协委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郭媛媛对此有同感。

“原来的高校教育、传统教育已不适应科技快速发展时代。”郭媛媛说。

她为此建议，由教育部和科技部等协同，以政策和专项资金为主导，加快推进高校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为基础的智慧校园全覆盖、升级版建设，保持高校在智能化建设领域的领先地位。

“‘数智素养’是人机协同时代必备的素养。”郭媛媛建议，大幅度强化、提升智慧教室在高校基础设施中的建设比例，促进大学生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所需的创新开放学习习惯与思维模式养成。

张云泉也建议，教育领域要及时更新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应对课程内容更新滞后的问题，学校需要及时更新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与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领域同步。

“现在业界变化太快，我还建议，通过实习、项目合作等方式帮助学生了解实际工作中的需求和挑战，从项目式学习中提高教育的实用性和有效性。”张云泉说。新质生产力所需的新型劳动者队伍，不只是能够创造新质生产力的战略人才，还需要大量能够熟练掌握新质生产资料的应用型人才。

全国人大代表、宁波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人力社保局局长叶苗注意到这一问题：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对于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建设释放出积极信号，这些人也是链接技术创新与生产实践最核心最基础的劳动要素，承担着打通技术突破和创造发明“最后一公里”的重任。

但她调研发现，技能人才，特别是高技术人才的供给与产业转型升级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呈现“四多四少”的特点：初级技能人才多，中高级技能人才少；建筑、纺织等传统型技能人才多，信息、能源、材料等现代型技能人才少；单一型技能人才多，复合型技能人才少；短期速成的人数多，系统培养的人数少。

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对于技能人才和职业教育仍有一定的偏见。叶苗说，社会上“重学历、轻技能”的学生和家长不在少数，技工教育也往往被视为“兜底教育”，吸引力不强，技工院校招生困难，技能人才培养供给力不足。

“我们国家正在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在这个过程中，呼唤更多的高素质人才在岗位上建功立业。”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电科网络通信研究院高级技师夏立说。

他注意到：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2021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印发了《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各级政府也紛紛推出激励技能人才的政策。

“但这些政策落地、落实还面临一些问题，职业教育体系不够完善，一些技能工人与管理岗位待遇存在差距。”夏立呼吁提高产业工人和劳动阶层的待遇。他建议，各级政府和单位出台更为明确的政策文件，相应的奖励、激励政策，指导解决好分配问题，提升技能人才爱岗敬业的精神。

叶苗也建议，持续优化技能生态，不断营造整个社会崇尚技能、尊重技术人才的浓厚氛围。从加快职业技能培训国家立法，统筹推进新职业新工种开发配套工作、修订完善“技工院校设置标准”、调整高技术人才的评价主体等方面入手，为技能人才培训、评价提供有力支撑。

在3月5日举行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首场“部长通道”上，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张玉卓谈及新质生产力时说，我们的劳动者是具有先进水平的劳动者，我们掌握的劳动资料是最先进、最好的劳动资料。要鼓励科技工作者敢于走最难走的路，敢于攀登最高的山峰，敢于攻克最坚固的堡垒，以实实在在的作为，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发展新质生产力，最终要靠人才。”张玉卓说。

本报北京3月6日电